

化橘红考源及其中药文化的核心价值

周燕超

化州古称石龙,始设于北宋太平兴国五年,地处广东省西南部,因盛产正宗化橘红而被命名为“中国化橘红之乡”,素有橘州、橘城、橘乡的美誉。

化橘红种植和加工炮制始于汉朝,隋、唐、宋、元不断发展,明清享负盛名,迄今已有2200多年的悠久历史。化橘红素有“南方人参”之称和“治痰如神,每片真者值一金”的说法,具有宽中下气、散寒燥湿、健胃利气、消痰止咳之功能,曾被列为明清两代宫廷贡品。经现代医学研究和实践证明,化橘红不仅是当今国内止咳类药物不可缺少的原料,而且在人体美容、工艺产品、心血管疾病应用药物和食用保健方面也具有重要价值,被列为国家中药和国家地理标志保护产品。

化橘红既是化州特有的道地中药材,也是化州传统文化的重要标志。一直以来,其秉持“济世救民、药食同源”的核心理念,于时光流逝之中而不衰,不断地传承、创新、发展,屹立于祖国大地,成了中华药食文化的杰出代表。

一、化橘红的历史考源

据现存的史料记载,化橘红原为野生柚树,来源于芸香科植物化州柚,由于吸收了化州当地土质中所含的礞石元素,又经历了漫长岁月,因而逐渐进化而成。化橘红相传自汉代开始种植,但最早的文字记载见于明代万历年间曾志遇等纂修的《高州府志》,该书载:“化橘红唯化州独有”。由于化橘红只能在化州境内某些独特的地质及生态环境中生长,药效独特,产品珍贵,故历来便有“每片真者值一金”的说法。

关于化橘红中药药用价值的民间传说甚多。相传化州古时是荒凉之地,民众多患痰咳。有罗辨者,怜悯民众困苦,种橘于石龙城内,所生橘红,消痰化痰有神效。由于化橘红具有健胃行气、化痰止咳等奇特药效,因而为医药学家李时珍所重视,并将其编入《本草纲目》,为人们所推崇。清代《考古辑要》卷四十六引用《郝志》内容,具体记述了罗辨

“仙人植橘”的传说。据此,罗辨可能就是发现化橘红药效和种植的始祖。

明、清至民国时期,化州境内的化橘红药品制作方法,主要以橘农手工操作为主,将橘红果加工成橘红皮、橘红珠,供药坊配剂。唐宋时期化州种植化橘红面积较大的有赖家园、李家园和潘家园。新中国成立后,20世纪50至70年代仍沿用传统方法对化橘红进行初级加工。1979年化州附城镇成立橘红制品厂,集中橘红药用制品技术人员20多人,除生产传统的橘红皮和橘红珠外,还开展对橘红新制剂的研究。1982年扩建成化州县橘红制品厂,批量生产橘红煎膏、橘红露和橘红冲剂等。1987年,化州县橘红制品厂发展为化州中药厂,批量生产以橘红为主要原料的橘红痰咳煎膏、橘红痰咳液、橘红丸、橘红酒等,并获广东省优质产品称号。

嘉庆十一年(1807),化州的赖家园和李家园开始对化橘红进行工艺加工,但品种单调,仅加工橘烟盒、橘茶罐,加工技术也秘而不宣,发展十分缓慢。1921年,赖、李两园制作的橘红工艺品,送广州工艺品赛会参赛获优等奖。1949年新中国成立后,化橘红工艺品得到长足发展,生产的工艺品有橘红瓶、橘红罐、橘红盒、橘红烟斗、橘红念珠等80多种,图案精美,手工细腻,产品供不应求。

二、化橘红中药文化的文化形态和文化内涵

化橘红中药文化的文化形态和文化内涵,主要体现在以下五个方面:

(一)化橘红种植历史悠久,汉代以来化州就已形成了化橘红中药材的种植文化。

化橘红的生长环境十分讲究,只有化州适合种植。化州在地理构造上属石、沙页岩风化土丘陵地段,多山地,有部分旱地,为亚热山地砖红壤,下层富含礞石、镁、锌、钛等元素。化州属亚热带季风暖湿气候区,热量丰富,光照充足,雨量充沛,为长夏无冬的南亚热带地区。所有这些

这些特定的地理气候条件,为化橘红中药材生产提供了得天独厚的自然条件,适宜在化州境内的山岭及早坡地种植。历史上化州种植化橘红面积较大的有赖家园、李家园和潘家园。至目前止,化州种植化橘红除这三大家园外,还有河西、官桥、中垌、平定、江湖、林尘等10多个乡镇。由此可见,在“济世救民”的中医药传统理念的推动下,汉代以来化州就已形成了化橘红中药材的种植文化。

(二)自古至今,在化州民间及周边地区广泛流传着许多关于化橘红种植和药用价值的神奇传说和众多关于化橘红的诗文、对联、题咏,已构成了化橘红中药的一种特殊的文化形态。

2200多年来,在化州及周边地区广泛流传着“龙化橘树”“鸟送橘种”“罗仙植橘”“范公识橘”“州官治咳”“婢女复生”等诸多神奇传说,和众多吟颂化橘红的诗文、题咏,如“杏花天地厚,礞石地添灵。二气深培橘,除痰辟肺宁。明清为贡品,珍贵赫皇廷。毛正香尤溢,中西负盛名。”“近水楼台宜对月,经秋橘柚早含霜。园居何减高山乐,棋隐还传春寿方。”“几树玲瓏透夕阳,微风拂拭灿生光。宝珠翡翠今无用,驛使争传橘柚香。”“杏花深处有人家,指点名园小径斜。一派寒光笼橘柚,半湾流水洗桑麻。鱼吹细浪荷香送,鸟弄清阴树影遮。闲愁幽亭凭眺望,不知尘世几年华。”等等。以上这些广泛流传于民间的关于化橘红中药奇特药效的传说和众多关于化橘红的诗文、对联、题咏,已构成了化橘红中药的一种特殊的文化形态。

(三)化橘红独特的药用功效载入古今重要的医药典籍,成了中华医药文化的组成部分。

化橘红中药文化源远流长,它几乎和化州的历史发展同根同脉。2200多年来,当地的传承人们秉承着“济世救人、药食同源”的核心价值观,开发出一系列富有地域特色的“化橘红中成药”,代代相传,垂范

后世,竖立了一块千年不倒的金字招牌,被誉为“南方人参”。

明朝李时珍编写的《本草纲目》载:“橘红佳品,其瓤内有红白之分,利气、化痰、止咳功倍于它药……其功愈陈愈良。”清朝赵学敏编写的《本草纲目拾遗》载:“橘红治痰症,消油腻、消食、醒酒、宽中、解蟹毒。”清光绪十四年彭以孙编写的《化州志》载:“化州橘红,治痰如神,每片真者可值一金,每年结实,循例报明上官,至期采摘批制,即官斯土者亦不易得。”民国陈存仁编写的《药学大辞典》载:“化州橘红,性味辛、苦、温,功用为化痰、理气、健胃、消食,治胸中痰滞、咳嗽气喘、呕吐呃逆,伤食积滞。”解放后编修的历部《中华人民共和国药典》载:“化橘红辛、苦、温,归肺脾经,具散寒、燥湿、利气、消痰功能,用于风寒咳嗽,喉痒痰多、食积伤酒、呃逆痞闷等症。”

现代医学研究也表明,化橘红除了药用的有效成分柚皮苷等黄酮、类化合物外,还蕴含挥发油、植物氨基酸及微量元素等成分,不但具备了古医学上确认的止咳化痰、治疗心胃气痛和醒酒功能,而且还是防治心脑血管疾病、内分泌功能紊乱和人体美容的优良原料。

(四)化橘红中药的炮制技艺虽不复杂,但民间药坊能善于利用药材的特点因材施教,在二千多年的传承中显示了其技艺的生命力,成了一份珍贵的非物质文化遗产。

化橘红中药十分注重炮制,坊间早有“炮制不严而药性不准”之说。化橘红在每年四月份开花,七八月份青色的果实长到直径10厘米左右时,就开始采摘。摘下来的幼果首先要清洗干净,然后在开水中略微浸一下,随即捞出来,送入烘干机设备烘干。干燥之后,切丝或片,生用,就可以入药。化橘红炮制分为修制(纯净、切制)、水制(洗、漂)、火制(晒、烘)等几种,化橘红炮制历来讲究遵古仿真。

化橘红中药炮制技艺虽不复杂,但在二千多年的传承中却显示了其技艺的生命力,成了一份珍贵

的非物质文化遗产。2011年,化橘红中药文化被批准为广东省非物质文化遗产。至2011年,化州利用化橘红炮制技艺进行科学研究和产品开发的企业有20多家,采用化橘红原料加工、开发、生产出来的系列产品达100多种,如橘红痰咳液、橘红痰咳煎膏、橘红丸、橘红颗粒、橘红中药饮片等等,形成了较为完整的化橘红产业链条。北京、上海、四川、云南、广东、广西等地也纷纷采用化橘红进行科学研究并开发高科技产品。

(五)由化橘红中药衍生出来的工艺品,既保持了一定的药效,又融合了雕刻、塑造等传统艺术和多样化的生活题材,更拓展了化橘红中药文化的人文内涵,丰富了其文化形态。

化橘红全身都是宝。化橘红成为中药材用的是皮,利用橘红胎经过特殊的加工,可制作形态各异的工艺品,如橘红壶、橘红瓶、橘红罐、橘红烟斗等。用这些工艺品(如橘红壶、橘红瓶、橘红罐)装茶、装酒,饮后具有止咳化痰、消除疲劳之功效;利用橘红烟斗抽烟,也具有宽中下气、散寒燥湿之功效。这些工艺品表面既有花鸟虫鱼,又有山水风景,图案十分优美。化橘红工艺品制作起源于明代,盛行于清代,清嘉庆十一年,赖、李两家橘红园开始对化橘红进行工艺加工。清末,赖、李家园共同制作的化橘红工艺品参加法国巴黎工艺品展览获银奖。民国时期和解放后不断发展延续。2005年以来,化橘红工艺品制作艺人每年均在广州、深圳、佛山、东莞、湛江等地开设工艺品展销摊档,产品供不应求,得到社会的一致好评。至今,化橘红工艺品既融合了众多的传统艺术和多样化的生活题材,又丰富了化橘红中药文化的人文内涵和文化形态,具有很高的艺术欣赏价值。

综上所述,化橘红中药文化由民间传入宫廷,再由宫廷走向民间,它的品牌价值和传承发展已在中国形成了独特的“文化体系”。

汉越交融视域下洗夫人对中古岭南文化的影响

陈玉槐

五岭横亘,山海环绕,岭南自古是多族群共同生活的土地。和中原成熟完备的礼乐文明相比,中古时期的岭南长期被中原典籍视作荒远边地。族群杂处,社会结构各异,地方文化自成体系。过往研究岭南文化的生成,大多从中原移民南迁的文化传播入手,习惯从中原单向教化边疆的角度展开讨论,重点考察广府、客家、潮汕系的文化演变,一定程度上忽略了岭南本土土著族群在中华文明多元一体格局形成过程中的主动性,俾人群体在中古岭南文化定型阶段的作用常常被低估。

梁、陈、隋政权交替之际,高凉出现的洗夫人,正是改变岭南西部文化走向的关键人物。她不是被动接纳中原文明的外来教化对象,而是以本土部族首领身份,主动联结中央王朝,促成部族和解,吸收先进制度与文明,推动俾越本土文化和中原汉文化彼此调适、相互融合,打破粤西、琼北岭南部落分立、文化封闭的局面,为后世岭南完整文化体系的形成打下西部根基。

翻阅知网现有文献,洗夫人相关研究大致分为三类。一类为史实考辨,依托正史、地方志梳理她的生平军事事迹;一类偏向民俗调查,围绕洗夫人信俗、军坡祭祀、民间口头传说,梳理民俗传承脉络;还有一类立足现实应用,从基层治理、乡村文明、文旅开发等角度阐释好心文化的当代价值。现有成果仍有可拓展之处,不少文章把洗夫人单纯当成政治人物或是文化符号,割裂她的治理举措和上古岭南文化转型之间的关联,较少讨论她在区域文化整合、汉越文明互动、海疆文化建构上的作用。部分写作偏重宣传话语,缺少中古社会结构的分析,也常将民间传说直接当作史料使用,这为本研究留下可供深挖的空间。

本文立足于汉越交融视角,跳出中原文化单向输出的传统思路,以史料考据为基础,区分正史记载与后世民间传说,客观讨论洗夫人治理实践对上古岭南社会、制度、民俗与海洋文化带来的改变,梳理岭南西部文化由部落原生形态逐步汇入中华主流文明的过程,补充中古岭南本土文化整合的相关细节,为岭南文脉溯源、非遗保护和地方文化建设提供史实支撑。

本研究时段限定梁大同初年至隋仁寿初年,核心区域为高凉郡,覆盖今天茂名、阳江以及海南岛北部。采用文献考据法与历史文化地理研究法,核心史料取自《隋书·谯国夫人传》,辅以《北史》《资治通鉴》,参考《广东通志》《高州府志》

《电白县志》等地方志,结合核心期刊成果。行文坚持论必有据,不做没有史料支撑的主观推演。

一、洗夫人出世前中古岭南高凉地区的原生文化格局

南北朝战乱不休,中原政权更迭频繁,中央对边疆管控力量减弱,五岭的地理阻隔进一步拉大岭南和中原之政治与文化距离。高凉作为俾人核心聚居地,形成相对封闭的部落文明,族群分散,秩序不稳,文化闭塞,山区与沿海的文化面貌差异明显,这也是中古粤西文化区别于中原、珠三角岭南文化的特点。

从族群与社会形态来看,《隋书》记载俾人“跨据山洞,部落十余万家”。部族数量众多,散布山野,各自为政。但俾各部以血缘部族作为基本社会单元,没有统一的行政规范。为争夺土地、水源、山海物产,部族之间世代仇杀,史籍所载“好相攻击”,便是当时长期存在的社会风俗。这种部族生存模式让高凉难以形成稳定社会秩序,部族内部重血缘情义,轻视王朝礼法。中原律法只能在少数城池推行,很难深入山洞。部族纠纷依首领威望与古老习俗裁决,一旦跨部族产生矛盾,极易演变为长期械斗,百姓常年不得安居。

行政建制与文化交流层面,西汉曾在海南设立珠崖郡,后续因土著反抗,治理成本过高,文化隔阂深重,朝廷放弃郡县建制,海南岛脱离中央管理长达六百余年。这段时期,琼北俾人与高凉俾人本属同源,往来频繁,海岛形成独立的部落文化圈。文字、教育、礼制、农耕技术发展缓慢,和大陆主流文明存在巨大鸿沟。大陆与海岛虽有近海往来,但缺少稳定官方通道,文化交流只停留在民间零星接触,难以形成系统性的文明互通。

地域文化层面,古高凉形成山区、沿海二元文化面貌。山区俾人依托山林资源,延续火耕水耨的粗放农耕,辅以狩猎采集,完整保留土著风俗、口头传承与族群传统,文化封闭性强。沿海港湾倚托航海航道,渔业、近海商贸逐步发展,少量南迁汉人于此落脚,带有早期海洋文化的开放特质。南迁汉人大多定居城郭,恪守中原礼乐,与山野俾人地域相隔、风俗悬殊,族群隔阂很深,文化交流难以开展。

整体来看,洗夫人登场之前,岭南西部并非全然蛮荒。俾人拥有成熟的族群组织、生存技艺与本土文化,但族群割裂、政教失序,山海阻隔,本土文化零散无序,无法完成区域整合,难以汇入中华文明主干。正是这样破碎封闭的格局,催生岭南文化转型的时代需求,也为洗夫人推动汉越交融创造了历史条件。

二、洗夫人治政实践对汉越文化双向交融的推动

洗夫人出身高凉俾族望族,年少便有胆识谋略,熟悉部族治理,凭借威望收拢周边俾部,成为岭南影响力突出的土著首领。她扎根岭南本土,拥护中央统一,谋求地方长久安定。通过汉俾联姻、和辑百越、移置崖州、推广生产教化等举措,打破汉越之间的文化壁垒,促成中原制度文明和岭南土著文化彼此兼容、深度互动,慢慢改变中古岭南文化的走向。

2.1 汉俾政治联姻,搭建族群文化交融的通道

北燕后裔冯宝出任高凉太守之时,冯家三代在岭南担任地方长官,却一直“代乡羁縻,号令不行”。冯家拥有朝廷授予的行政职权,却缺少俾族本土威望,难以管控山野部落;洗夫人拥有部族礼义与武装力量,却没有官方行政名分,不便对接中央王朝。出于地方长治久安的考量,洗夫人与冯宝结为夫妻,这件事成为中古岭南汉越文化交融的标志节点。

这场联姻不只是家族嫁娶,更是中原官僚体系和岭南土著部族体系的结合,是行政治理和文化认同的双向对接。婚后洗夫人约束本宗族人,劝俾民摒弃部落旧俗,遵守官府礼法。《隋书·谯国夫人》载:“夫人诫约本宗,使从民礼。每共宝参决诉讼,首领有犯法者,虽是亲族,无所舍纵。”这一做法,打破俾族旧有“亲族免刑、部落自决”的习惯,中原法治与礼法规范,逐步进入俾人社会。

洗夫人并未全盘否定俾族本土习俗与部族治理传统。俾族首领依旧保留乡土治理权责,俾民固有的生活习俗得到尊重,没有采取一刀切的强制同化。这种“礼法遵从王朝,风俗保留乡土”的治理方式,促成汉、俾文化互相包容,消解长久的族群对立。族群通婚、风俗互鉴慢慢成为常态,岭南多元包容的文化特质由此生长。

2.2 和辑百越安境,重塑岭南乡土伦理体系

部族间仇杀,是中古岭南社会最大的隐患,也阻碍文化持续发展。洗夫人兄长洗提曾任南梁州刺史,依仗部族实力,时常侵掠邻郡,周边部族屡遭战乱之苦。为平息纷争,洗夫人多次规劝,陈述征战带来的灾祸,最终劝止兄长,化解各部矛盾,安抚俾僚诸部。

以德化代替征伐的治理思路,

得到岭南各部的拥戴,远至海南儋耳千余洞俾人主动归附。治理过程之中,洗夫人把儒家孝悌仁义理念,和俾族原有重信义、重乡邻和睦的族群品格结合,重构岭南西部的乡土道德。俾人原本的道德准则局限于部族内部,带有排他性;洗夫人倡导的疆土、跨越族群、山海与地域,追求疆土一统、邻里安宁。

晚年她留下家训告诫子孙:“汝等宜尽赤心向天子。我事三代主,唯用一好心。今赐物具存,此忠孝之报也。愿汝皆思之。”这一理念,将个人德行、乡土治理和家国忠诚融为一体,形成岭南西部独有的好心伦理。对内劝人向善,平息争斗,和睦乡邻;对外坚守国家一统,反对割据。这套道德观念慢慢改变岭南民众的价值认知,成为中古岭南文化重要的精神标识。

2.3 移置崖州建制,拓展岭南海疆文化版图

梁陈换代,天下动荡,各地豪强纷纷谋求自立,岭南不少地方势力也打算割据自保。洗夫人坚守统一立场,不依附割据力量,带领岭南各部归附隋朝。为解决海南岛长期治理真空、文化隔绝的难题,她上书朝廷,请求移置崖州。

据史志记载,梁大同年间,儋耳千余洞俾僚归附冯洗集团后,洗夫人请命于朝,将崖州和珠崖郡移置于政基础较好的儋耳(治义伦,今海南儋州)。隋朝采纳提议,在海南岛恢复郡县,结束六百余年无中央郡县管辖的局面,海岛正式纳入王朝行政与文化体系。崖州移置,意义不止于疆域管控,更是岭南海疆文化发展的重要节点。郡县落地海南后,中原文字教育、礼乐制度、农耕技术渡海入岛,打破岭南海岛的文化封闭。

依托高凉、琼北俾人同源的族群联系,粤西的乡土伦理与民俗习俗逐步传入海南,形成高凉—雷州—琼北连片的岭南西部文化带。岭南文化不再局限大陆沿海,延伸至南海岛屿,形成山海相连的文化格局,也为后来岭南海洋文化、海外华侨文化埋下伏笔。

2.4 推广生产技艺,夯实岭南物质文化根基

文化交融离不开物质生产作为支撑。中古高凉俾区长期采用火耕水耨,生产效率低下,物资不足,文教难以普及。地方安定之后,洗夫人引入中原铁制农具、垦荒与谷物种植技术,引导民众开荒耕种,改善粗放农耕模式。

同时,她保护岭南本土手工业,传承俾人葛布织造技艺,推动本土物产流通。俾人织造的葛布、吉贝布,

是岭南特色物产,在安定环境中向外交流。山海秩序平稳之后,沿海港口商贸复苏,渔业、海运逐步兴起,中原物资和岭南山海特产互通往来。

生产方式转变带动物质与文化生活更新。定居农耕普及,中原宗族、家风礼仪得以扎根乡土;山海商贸兴起,养成岭南务实进取、面向海洋的文化气质。中原技术助力岭南本土发展,岭南山海物产也丰富中原文明,实现汉越物质层面的双向增益。

三、洗夫人信俗传承:中古岭南文化的千年活态延续

洗夫人在世之时,保境安民,惠及山海,岭南百姓尊她为“圣母”。陈朝覆灭之际,岭南数郡共同推举她保境安民,足见她深厚的民间声望。洗夫人离世之后,其孙冯盎率先立祠祭祀,开启官方与民间共同祭祀洗夫人的历史。历经隋、唐、宋、元、明、清,朝廷多次敕封,民间不断修建祠庙。洗夫人由真实的治政人物,慢慢演变为护佑乡土的神明,发展成体系完整、流传广泛的洗夫人信俗。

洗夫人信俗区别于一般民间信仰,特点在于史俗同源,以德行为祭祀根基。信仰并非依托虚幻神话,而是来自可考的历史功绩与家国德行。粤西、海南遍布数百座洗太庙,除祭祀功能外,还是传统乡村的公共文化场所。庙内留存历代碑刻、楹联,记录岭南社会变迁与民俗演变,属于珍贵地方史料。每年洗太诞、军坡巡游、祭祀仪式,以仪式传承好心精神,凝聚乡土情感。旧时村落之中,庙宇还承担调解纠纷、宣讲教化的功能,把好心伦理融入日常乡土生活。

明清时期,大批粤西民众远赴南洋谋生,洗夫人信仰随之传到东南亚华人社群。海外华人借祭祀洗夫人维系故土记忆,坚守家国情怀,洗夫人文化由此成为联结海内外岭南人的文化纽带。2014年,“民间信仰俗(洗夫人信俗)”列入第四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扩展项目),标志这份源自汉越交融的乡土文化,得到国家级层面的认可。

需要区分,后世民间口头传说、传奇故事属于文化流变的产物,不能直接当作正史史料。但这些民间演绎,反映民众对安宁、和睦、国家一统的向往,是岭南民间文化的组成部分,见证汉越交融文化跨越千年的传承演变。

四、洗夫人对上古岭南文化影响的历史定位与当代价值

纵观岭南文化漫长发展历程,中原移民南迁带来的文化传播,塑造广府、客家、潮汕文化的主体面

三、化橘红中药文化的核心价值

(一)历史价值。化橘红中药文化源于汉朝,隋、唐、宋、元不断发展,明清享负盛名,距今已有2200多年的悠久历史。唐宋时期化州种植化橘红面积较大的有赖家园、李家园和潘家园,至今还享有盛誉。明代万历年间的《高州府志》载曰“化橘红唯化州独有”;其后,《本草纲目拾遗》《药学大辞典》等药典也均有记载,列入中国“四大南药之一”和“十大广药之一”。

(二)文化价值。化橘红自问世以来,始终秉承着“药食同源、济世救民”的核心价值观,于时光流逝中而不衰,一如既往地造福人类。它承载的关于化橘红中药文化的内涵,以及化橘红中药制品的独特功效,深受百姓的厚爱和信任。它是化州地域文化的重要象征和标志,是中华医药文化经典的重要元素。

(三)药食价值。化橘红药用功效神奇。明朝李时珍编写的《本草纲目》、清朝赵学敏编写的《本草纲目拾遗》、清光绪十四年彭以孙编写的《药学大辞典》和解放后编修的历部《中华人民共和国药典》均有记载。现代医学研究也证明,化橘红不但具备了古医学上确认的止咳化痰、治疗心胃气痛和醒酒功能,还是防治心脑血管疾病、内分泌功能紊乱等的优良原料。其食用功效更为广泛,经过炮制过的化橘红花果吃了可止渴生津、益脾润肺、消食解闷、醒酒美容等。

(四)科研价值。化橘红,南亚热带芸香科植物,气味芳香、味苦、微辛,具有宽中下气、散寒燥湿、健胃利气、消炎止咳的特殊功效,明代以前已普遍为医家处方使用。现代医学研究也表明,化橘红除了药用的有效成分柚皮苷等黄酮类化合物外,还蕴含挥发油、植物氨基酸及微量元素等成分,不但具备了古医学上确认的止咳化痰、治疗心胃气痛和醒酒功能,还是防治心脑血管疾病、内分泌功能紊乱和人体美容的优良原料。